

【论 文】

1940 年的盛世才与他治理下的新疆

——读《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¹

马 戎

摘要：民国时期曾经统治新疆长达十二年的军阀盛世才，在 1940 年曾在新疆制造了一个“国际阴谋暴动案”，涉及新疆各族官员数百人和苏联驻新疆多名外交官。在该案审讯过程中，盛世才多次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电报和外交邮件，汇报讨论案情。其中部分原始档案文件由当年在新疆军队服役的张大军先生于 1949 年带到台湾，1997 年在台中市出版，书名为《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本文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介绍了这一“暴动案”档案文件的主要内容，分析了盛世才本人的政治理念及他与斯大林的交往，这些讨论有助于今天的读者认识 1940 年代的盛世才和他治理下的新疆。

关键词：盛世才 1940 年新疆国际阴谋暴动案 斯大林

2013 年春季，应台湾中兴大学王明珂教授的邀请，我在位于台中市中兴大学访问三个月。在此期间，通过台湾政治大学的张中复教授得知《新疆风暴七十年》的作者张大军先生就住在台中，立刻就想到要去拜访他。1980 年由台北兰溪出版社出版的《新疆风暴七十年》共 12 卷长达 7429 页，我在十多年前就读过，是一部详细记述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状况的极具史料价值的巨著，如果能有机会见到这位当年新疆政治风云的亲历者，在我自然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从网络上查阅《新疆风暴七十年》的评论，我看到有关张大军先生的一段简介：

张大军，原系国民党叶成部上校参谋，在新疆 923 和平起义后，用了十几头骆驼将上万卷新疆历史档案载运走，随叶成经南疆，途中历尽艰苦，转道印度到台湾，几乎扔掉了全部随身物件，但没有丢弃一份档案材料。回到台湾后，张大军潜心研究新疆历史，于 1980 年出版了 500 余万字的《新疆风暴七十年》，记载了由 1909 年至成书之时，新疆之历史进程。作者利用了从新疆带走的省政府的档案资料，以及大量的报刊、回忆录和他本人的采访及调查资料，该书资料丰富，其中对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也有较全面的研究，如领土、勘界、商贸和英侨等。此书是研究新疆现代史的权威之作²。

这些宝贵的历史档案文件，在战火中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据张大军在《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的“主编者序”中提到“尚有许多俄文致莫斯科文件，不幸在经过喀喇昆仑山时，马匹坠入山涧遗失，仅存此约四十余年的密档”，可见当年的旅途是何等之艰难，这些留下的史料是何等之珍贵。

2013 年 3 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在张大军先生寓所见到这位 102 岁的老人，可能是出身行伍的原因，他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对 40 年代的许多往事记得非常清楚，也许是平时很少有人与他谈及民国时期的新疆，老人很兴奋也很健谈。这位百岁老人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向老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临别时，老先生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外，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离去，远远地看着老人在门旁伫立的身影，想到国共内战和两岸沧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¹ 本文刊发于《青海民族研究》2015 年第 1 期。

² <http://bbs.my0511.com/f152b-t4656497z-1-6>





2013年3月摄于台中张大军先生寓所

在交谈中，老人送给我们一本1997年由他主编出版的另外一本书，这就是本文主题中的《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中亚出版社），并题字留念。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上课和其他杂事，直到2014年暑假才抽出时间来阅读这本书，发现这份史料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首先是历史真实性，它是完全根据新疆密档中的原稿刊印的；第二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案情陈述和原始笔录，字里行间透露出当年新疆党政机关内部的运行规则，特别是生动地展示了苏联顾问和苏籍人员在新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位置与作用；第三，盛世才本人向斯大林的长篇“陈情自白”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统治新疆十二年的铁腕人物和他的政治观念。也许这些写给斯大林看的文字并不完全是他的真心话，但是至少表明他把这套“斯大林式”的政治概念和思维逻辑已运用得极为纯熟。

在民国政府地方军政首领当中，盛世才确实与众不同。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曾先后三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接待，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不曾得到的。正是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被秘密吸收加入苏共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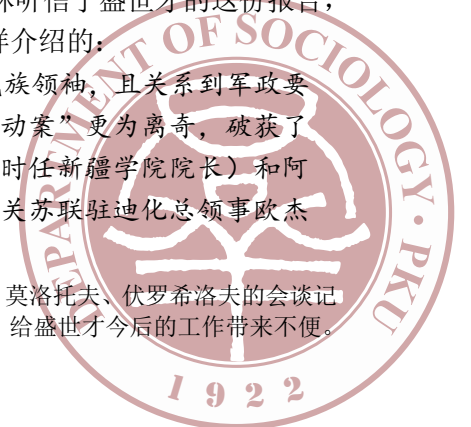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本书中介绍的部分内容讨论几个问题，看看这些原始档案材料能否帮助我们认识盛世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民国时期在他治理下的新疆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据张大军先生在“序”中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是1940年6-7月新疆督办盛世才给苏联领袖斯大林呈报的几份秘密报告全文及附件，主题是对当时在新疆审讯的“国际阴谋暴动案”的审讯过程、犯人口供以及盛世才本人对案情的陈述。这一案件当时成为轰动国际的新闻，涉及新疆省副主席、多位厅局级省政府和地方高官，甚至在审讯过程中还牵扯到苏联驻新疆的高级外交官和苏联内务部官员。涉案的国内官员大多被处死或“意外死亡”。斯大林听信了盛世才的这份报告，因此那些被涉及到的苏联官员都被“极刑处理”。“序”中对此是这样介绍的：

（盛世才）十多年中，翻云覆雨，杀人如艺，不仅牵涉到各民族领袖，且关系到军政要员，尤其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新疆的“带国际性的大阴谋暴动案”更为离奇，破获了维族领袖和加·尼牙孜（新疆省副主席）、汉族暴动领袖杜重远（时任新疆学院院长）和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及文化人沈雁冰（茅盾）、张忠实等人；更有关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欧杰

¹ 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担心此事泄露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http://baike.so.com/doc/1454444.html>



阳克、阿山领事苏里唐诺夫，以及英国领事等。盛世才为此一国际大暴动案，牵涉联共、中共与苏联领事、军事顾问等关系复杂，特请莫斯科派员协助审讯，于是斯大林特派葛内斤、卡克雷金等来新（疆）协助。孰料这些苏联专家来新（疆）审问犯人时，全部翻供，谓系盛氏审讯人员以酷刑迫出来的，向盛提出了声明书。盛闻之大怒，旋向莫斯科提出声复书，另请聂色克来参加审讯。不料聂色克也认为是酷刑拷打逼出来的口供。盛便向莫斯科提出检举，控告他们是同情托派组织参加阴谋工作。斯大林看到数十万言的报告书，其内政部派来的干员居然在新疆违反‘马列斯’主义，人员成为托洛茨基匪徒，真是火冒三丈。这齣好戏在斯大林面前扮演了很久，苏联派来的人，均被调回以极刑处理。同时盛氏也清除了在新疆的联共党徒，也警告中共在新疆要安分守己。……

此稿系由盛世才督办公署秘密档案中发现，……以蓝色打字大型原稿，共 487 张，内中经过盛世才以蓝色亲笔改正处极多（张大军，1997：5-6）。

从张大军先生编辑的《报告书》和《新疆风暴七十年》两本书中可以了解到，盛世才在 1940 年 6 月 18 日给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同日发出两封电报。6 月 19 日去电一封，指控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欧杰阳克等人“是帮助英帝国主义领导新疆阴谋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由于担心通过苏联领馆转送的邮件可能出现误差，盛还另发送一整套材料给自己在莫斯科学习的弟弟盛世骥，并在电报中特别要求“关于欧杰阳克、叶尔洛夫、阿不都热合满及齐合云斯克（均为苏联领馆官员）等的重要材料，均存在于留莫斯科陆军大学生盛世骥手中，请伏罗希洛夫元帅或莫洛托夫委员长迅速召见盛世骥，即能由盛世骥将材料交给你们”。从这种安排，也可以看出盛世才做事之细致缜密。

6 月 20 日盛世才再给斯大林等人发去长电一封。6 月 24 日又发出一份电报，直接控告 6 月初苏联派来参与审讯的内务部人员葛内斤、恰克雷斤两人诱使犯人翻供。6 月 27 日再发特急电报“请你们火速加派最忠实列宁斯大林党的三五人来新疆帮助审讯工作，在这三五人内最好希望你们最亲信的、最忠实于你们二三人参加到里面为盼”（张大军，1997：12）。

7 月 5 日盛世才又发出一份电报，控告苏联第二次派来参与审讯的内务部人员聂色克与葛内斤、恰克雷斤同样诱使犯人翻供，并“诬蔑”盛安排的审案人员李溥霖、李英奇，盛世才在这封电报中逐条反驳聂色克的《声明书》。7 月 18 日，盛通过苏联总领事外交邮差转送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关于“国际阴谋暴动案”全部口供和盛本人的说明材料，之后又发电报对 7 月 18 日的邮件加以说明，表示该邮件分别送斯大林等三人“亲自拆阅”，外皮用火漆封住，火漆上有“盛世才”三字的水晶名章，“同时在各本材料里边的每页上均书有盛世才三字的名章，务必希望你们抽暇详细阅看为盼”（张大军，1997：65）。盛世才直接发送到莫斯科的电报的台头是：“尊敬的斯大林先生、莫洛托夫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大元帅”，结尾是“谨此恭请你们的身体健康，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²在这两个月内，盛世才发往莫斯科的电报和邮件频率之密集，篇幅之巨大，实属罕见。

此案在新疆共拘捕五百余人，涉及汉、维、哈、回、柯、蒙、塔等各族高级官员和军官，此案的审理对新疆政局和民族关系影响深远。据盛的回忆录称，此案在新疆仅处死 59 人，但是后来的调查证实，杜重远、库尔班·尼亚孜等实际上均在狱中被毒死（张大军，1980：4312-4313），大批人犯长期关押。直至 1944 年 9 月盛世才离开新疆、吴忠信主政新疆后，包尔汉等涉案人员

¹ 盛世骥是盛世才的三弟，长期留学苏联并主张亲苏，返回新疆后担任新疆机械化旅旅长。1942 年，盛世才转变政治态度，开始反苏反共，在他进行政治大清洗之前首先暗杀了亲弟弟盛世骥。

² 据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回忆，1940 年春季他曾关押在第四监狱，公安处要求他将一些材料译成俄文，“其中有盛世才写给斯大林的信，信里诬称派来的干部都是托派，请斯大林另派一些可靠的人来”（包尔汉，1984：271）。



于11月得以释放出狱。而盛世才控告的苏联人员，均被调回处死¹。

张大军先生主编出版的《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中收集了6月27日、7月18日的邮件及之后的电报内容。全书分十三编70章共581页，由于主要内容是省政府、不同地区涉案人员的供词和参审人员的记录，涉及许多人员与事件的细节，读起来难免有些枯燥。但是盛世才对这些供词的归纳和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对于研究民国历史的人而言，还是值得一读的。

二、盛世才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自我表白

首先介绍一下盛世才这份报告书的时代背景。1939年9月和10月，苏联和德国瓜分了波兰，苏联随后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1940年德军占领了荷兰、比利时，逼迫法国投降并空袭英国，1941年春季德军在攻占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后，于6月22日跨越苏联边境，发动全面侵苏战争。盛世才的《上斯大林报告书》签署的日期是1940年6月27日，恰恰在苏联向西推进的一年之后和德军进攻苏联的一年之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和敏感的历史时刻。

在国内抗日战场上，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阳）宜（昌）战役，6月12日攻占宜昌，张自忠将军殉国，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抗战形势极为严峻。在苏联国内，1934-1938年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党政军各部门开展了“大清洗”，把托洛茨基驱除出国，处死了大批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高层领导人，全面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1939年苏联与日本和希特勒德国分别签订了《停战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此时，处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省在财政、军械、物资各方面不但不能从内地得到支持，而且成为从苏联向中国抗日前线运送物资的重要战略通道，所以民国政府对于盛世才在新疆实施“亲苏”政策，也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态度。

1. 该案发生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

在对“国际性各族联合大阴谋暴动案”的总结中，盛世才这样分析该案的政治背景：

这些新疆托匪、中国托匪及英日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对新疆一再进行破坏阴谋，丝毫不肯退步的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项：（1）新疆是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后方，是苏联援助中国的唯一运输要道，割断这条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要道，必须破坏新疆。（2）新疆的政权是反帝亲苏的政权，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和平阵线之重要外围据点。新疆现政府之存在节约了苏联警卫边界红军的巨大兵力，因此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及托匪企图进行反苏阴谋，在英属印度的边上树立起反苏根据地，则必须首先破坏与苏联几千里接壤的新疆。（3）因为新疆在六大政策，尤其是反帝亲苏两大政策领导之下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情况间接影响了和刺激了印度革命浪潮之高涨，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在印度之统治权，必须要首先破坏这个激动印度革命浪潮的新疆。（4）新疆有广大的土地，有丰富的宝藏，英日两帝国主义和托洛茨基匪徒，企图利用新疆民族复杂、文化落后、兵力薄弱这些条件，将新疆变为英日两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和反苏政权的根据地，以便他们取得现代战争机械兵团所需要的大量油田，而维持其强盗战争，必须要破坏新疆（张大军，1997：365-366）。

这段背景介绍完全以苏联的战略考量为中心，表明盛世才治理的新疆“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和平阵线之重要外围据点”，唯有支持他统治下的新疆，才能防止“新疆变为英日两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和反苏政权的根据地”。盛世才完全摸透了1940年斯大林的战略考虑，完全迎合了斯大林对周边区域的战略部署，自然很容易取得斯大林的信任。

¹ 《民国新疆史》认为“后来斯大林并未理会此事，只是将陈培生（边务处长）调回，又分到中国其他地方工作”（陈慧生、陈超，2007：360）。在1937年盛世才策划的另一起“阴谋暴动案”中，“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等被盛诬为“托派”后，送回苏联并执行枪决，那次清洗中，新疆区内被捕约2000人，解至迪化约800余人，“盛世才承认有33人被判处死刑”（陈慧生，陈超，2007：356）。



2. 涉案苏联人员的“社会主义”是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

但是在该案的供词中，盛世才检举的苏联驻新疆外交官对当地人员进行“阴谋煽动”所使用的话语都是“社会主义”话语，他们鼓励新疆参与该案人员发动暴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这应该是完全符合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理念的。所以，如果盛世才想控告他们，只能说这些苏联外交官的“社会主义话语”是伪装的面具，并把他们与斯大林最为痛恨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表明这些苏联官员推动的所谓“亲苏”，实际上亲的是“托派的苏联”，而不是斯大林的苏联。

但是托匪及英日帝国主义者亦曾亲眼看到：苏联的国力日益强大，和平外交政策日益胜利，中国抗战虽然现处在艰苦的阶段上，但其趋势已向着胜利前途迈进着，而使日寇泥足愈陷愈深。新疆方面政府六大政策，尤其是反帝亲苏两大政策，已教育着影响着全疆各族民众，而引导着各族民众趋向着反帝亲苏联的坦途前进，尤其是各族青年及反帝军已对反帝亲苏政策有了相当的信仰。这些事实告诉了人们：“公开在新疆树立反苏政权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要想在新疆进行反苏阴谋势必要拿出一套“似是而非”的“亲苏”主张，用来掩护他们反苏的丑恶面孔，用此蒙混一般人的注意，而便于他们进行活动。这次维族阴谋暴动组织标榜出成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的主张，正就是以“亲苏”做掩护而暗中进行反苏阴谋的表演（张大军，1997：367）。

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和威望使他成为斯大林争取苏联最高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列宁在遗嘱中曾高度评价托洛茨基，同时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因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极深。在苏共内部斗争中，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除出国，1938年成立“第四国际”，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暗杀¹。在德军进攻苏联之前，斯大林开展的主要政治运动就是彻底清除党内的“托派分子”。盛世才把这些苏联官员称为“托匪”，恰好触动了斯大林的痛处，而且这些驻新疆外交官大多来自苏联各中亚共和国，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期间很可能与他们有过接触，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托派”嫌疑。而“托派”的主要罪名（或者说主要策略）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反对斯大林。盛世才对这些苏联官员使用的分析逻辑与斯大林在党内“大清洗”的逻辑一拍即合。

盛世才指控苏联领事馆官员是“托派”时，还提供了中国“托派”的供词，争取将其做成“铁案”：

据杜重远亲笔供称：……我问重庆托派组织何以有把握介绍沃代总领事（即欧杰阳克），张（仲实）说沃代总领事原系**苏联托派**，我们共同的目标是破坏新疆现政府，妨碍中国抗战工作，最后好进攻苏联（张大军，1997：313）。

为了使杜重远的以上供词具有可信度，盛世才提供了该案审讯的多人的详尽供词（库尔班色·以多夫、沙里福汗、史枚）来证明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成为一名托派分子的始末以及杜重远在新疆开展“托派活动”和秘密会议上布置反苏阴谋暴动的大量旁证（张大军，1997：190-197，213-251，264-278）。

3. 为什么新疆不能马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新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错吗？让新疆的无产阶级、贫苦农牧民获得解放、掌握政权有什么错吗？这难道不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正当目标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盛世才还必须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对这一点加以说明。

首先，盛世才无法从原则上否认新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性：

原来新疆是具备着由旧世界跳跃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条件，这个条件首先表现在新疆与

¹ <http://baike.so.com/doc/6272310.html?from=125762&sid=6485734&redirect=search>



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理上有数千公里的土地毗连，以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予新疆以最大的优良影响，尤其是在此影响之下，新疆已建立起来了崭新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政权¹。一方面用六大政策的形式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各族先进青年教育着马列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充实着他们的意识和思想（现在新疆的文学校学生及军官学校学生均在课外研究列宁主义问题及斯大林传，并在正课内的讲堂上由讲师讲授新哲学“辩证唯物论”），一方面新疆与苏联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这不仅是说明我个人用六大政策领导着整个新疆经过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向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奔驰着，同时在客观上也确实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使新疆比中国其他各省先跳跃到社会主义新世界里边去（张大军，1997：368）。

他在承认存在这种客观可能性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努力表白自己在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斯大林（要求学生学习《斯大林传》）、推动新疆朝着“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目标迈进方面所做出的功绩，这无疑拉近了他与斯大林的感情与心理距离。但是话锋一转，他开始论证“在目前”新疆尚不适于“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由：

在六大政策，尤其是反帝亲苏政策领导下的新疆，虽然具备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与条件，但是在目前决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把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这一主张实行起来，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在新疆要实行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其所以错误的地方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目前新疆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而没‘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机’。因为新疆是中国的一省，是整个世界的一部份。……要在新疆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有以下几个机会：

(1) 印度革命浪潮高涨使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发生动摇并走向崩溃的时候。(2) 中国革命浪潮高涨，国内反动势力锐减或瓦解的时候。(3) 中国革命退潮，国内反动势力特别抬头的时候，如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大政党——国民党受亲日派之包围与压迫走到对日投降、进行内战进攻共产党，而使中华民族革命遭受危险的时候。……

因为在新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给印度民族革命以最大的鼓动，而予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以有力的威胁。如果这个情形不是在印度革命浪潮高涨的情势之下发生，那么英帝国主义定要拼全力扑灭这堆对自己特别不利的革命火焰，甚至对新疆进行武装干涉，这就等于挑拨英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反苏阴谋。

其次在新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在中国革命浪潮高涨的情势之下发生，那么必然要遭到中国国内反动势力之对抗，必然使中苏两国友善关系陷于破裂，而在中国抗战后方掀起国内反动势力与新疆之内鬩，破坏了中华民族抗战之前途。

但是如果遇到了中国革命退潮的时候，国内占最大势力的国民党已经对日投降，而对革命势力进行剿灭，中国有亡国危险的时候，新疆为了保存自身的革命实力，为了声援进步的势力，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为了彻底争取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胜利，为了反对国内一切反动投降势力，必须毅然决然站在最坚决的革命立场上，摆脱一切反动势力之束缚，在新疆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时对于英帝国主义及国内任何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均可有所不顾。相反地，如果中国革命并没有退潮的时候，而在新疆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就等于分裂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就等于破坏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这就等于在客观上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大军，1997：368-370）。

斯大林知道英国丘吉尔首相是坚决反共的，英国和法国在早期之所以对希特勒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就是希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的苏联。所以斯大林对英国的政治动向一直非常警惕。

¹ 六大政策中的“民平”指民族平等。



盛世才提出英国通过印度干预新疆并扩大英国在新疆影响力的可能性，斯大林对此具有同样的担心。从1940年的欧洲和亚洲形势来看，斯大林所最希望见到的局面就是保持新疆的现状。除非中国政府被像汪精卫这样的亲日派完全掌控，新疆有被日本势力控制的危险时，斯大林才会考虑推动改变新疆的现状。

盛世才认为不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的第二个理由是：

第二，新疆只能建立十四个民族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能建立单独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新疆共有十四个民族，这些民族都有数百年共生共荣的历史。在将来新疆得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时机，也必须建立十四个民族的“新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绝不能仅仅是单独一个维吾尔民族的“维吾尔斯坦”。维族阴谋组织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完全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之反动意识的表现，这里丝毫看不出一点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的韵味来（张大军，1997：370-371）。

从这段话来看，盛世才对新疆民族关系复杂性的认识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他真正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道路上，他曾经面对的竞争者包括了回族的马仲英、马虎山，汉族的张培元以及维吾尔、哈萨克族的地方首领，即使维吾尔族在新疆总人口中占大多数（当时一个说法是占80%），他也认为不宜在具有十四个民族“数百年共生共荣历史”的新疆把其中一个民族单独突出出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到了“狭隘民族主义之反动意识”。

4. 盛世才对斯大林的效忠表态

令斯大林读后心里最感舒服的一段话，应当是盛世才表达出来的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的绝对敬仰和坚决服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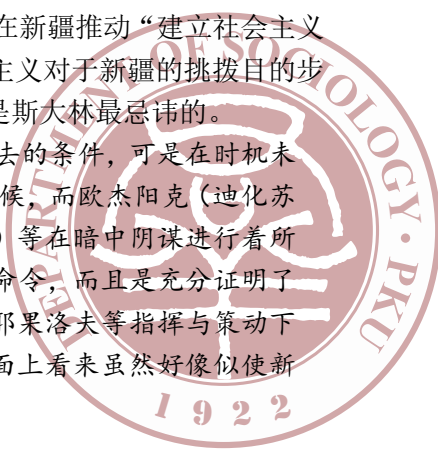
除去具备以上三个时机中的一个时机之外，还必须要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斯大林先生的允许才能够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任务在新疆“实行”起来（张大军，1997：369）。

同时，对于刚刚在强力下被合并进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盛世才表示了自己的羡慕之情，这不仅对斯大林吞并三国表示了肯定，而且暗示自己希望新疆有朝一日也能够如波罗的海三国那样“跳跃到新世界”。

我亦曾羡慕西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家已经得到了解放，已由旧的世界跳跃到新世界里去了。虽然他们与新疆一样同苏联在地理上接壤，并受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良影响；但是他们的国内形势与中国的国内形势却有诸多不同之处。现阶段国际形势给予他们的影响和给予新疆的影响，也存在着许多异点。爱、拉、立在今天跳跃到新的社会主义世界去，是由于抓住了有利的时机。同时他们这一跳跃对于自己、对于世界革命都是有利的。但是目前在新疆因为没有那样有利的机会，如果要像维族阴谋组织所主张的一样，在新疆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对于中国，对于苏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有害的（张大军，1997：370）。

最后话锋一转，盛世才把他检举的几位苏联外交官“定性”为“托洛茨基匪徒”并“阴谋反苏”。这些人居然在领袖斯大林没有直接下达命令的条件下，“擅自”在新疆推动“建立社会主义维吾尔斯坦”这样的重大活动，破坏斯大林的国际战略，“与英帝国主义对于新疆的挑拨目的步骤相一致”。熟悉斯大林人格特点的盛世才所强调的这几点，恰恰都是斯大林最忌讳的。

总之，一方面新疆虽然是具备着由旧世界跳跃进入新世界里去的条件，可是在时机未到和未能够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斯大林先生的允许的时候，而欧杰阳克（迪化苏代总领事）、阿不都热合满（苏领馆人员）、耶果洛夫（苏领馆人员）等在暗中阴谋进行着所谓组织‘社会主义维吾尔斯坦’的勾当，不只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命令，而且是充分证明了正是托洛茨基匪徒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欧杰阳克、阿不都热合满、耶果洛夫等指挥与策动下的维族阴谋组织在新疆组织‘社会主义维吾尔斯坦’的事件，在表面上看来虽然好像似使新



疆与苏联更加亲密起来，与实行马列主义。可是在骨子里便正是进行着违反马列主义与阴谋树立反苏的根据地。同时还充分暴露出他们对于中苏两大国的友善关系、对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各个势力的相互关系，对于新疆十四个民族亲密团结关系的离间与挑拨，他们这种挑拨与离间，按照下列的几项事实看来，也正与英帝国主义对于新疆的挑拨目的步骤相一致（张大军，1997：371）。

盛世才在莫斯科曾经三次会见斯大林，在这封报告书中，他自然也不会忘记强调一下自己与斯大林的特殊私人关系。

我有为马、列、斯主义前途胜利做斗争的七年长时间的历史原因，苏联与新疆的亲善一天比一天亲密的原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先生和他最忠实的战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先生对我个人的思想深刻了解、对我信任的关系，我才敢于检举他们（指苏联官员）（张大军，1997：383）。

这些用词难免不使我们回想起斯大林在世时苏联政坛上的“个人崇拜”话语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话语。“斯大林主义”一词最早由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提出，尽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斯大林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汇，但是盛世才在《报告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且把斯大林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本人至少对此是不会反感的。

最后盛世才声明，他将对于报告书中提交的事实及口供材料负全部责任：“不论到何时我是完全负责任的，倘要有冤枉了耶果洛夫、欧杰阳克、阿不都热合满等的地方，我甘愿以马、列、斯主义信徒的资格，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先生的面前领受任何严重的处罚！”（张大军，1997：384）。这完全像是帮会里一个表示忠心的下属对帮会领袖的赌咒发誓，哪里像是中国一个省的军政首脑与外国元首的国际交往。

三、盛世才对“国际阴谋暴动案”案情的具体陈述

1. 反驳苏联内务部来新疆参加审讯官员对盛世才亲信提出的指控

斯大林第二次派来对新疆“国际阴谋暴动案”进行审讯的苏联内务部官员聂色克对涉案人犯进行审讯后，明确提出盛世才安排对该案负责审讯的两名官员（审判委员会委员长李溥霖、公安处长李英奇）有严重逼供行为，所获得的证词不足信。盛世才对此进行申辩的方法是坚称此二人的政治正确性和人品可靠性，而证明这一点的依据是盛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干部政策。

该项所称各节并无事实的根据，因为李溥霖、李英奇不只是无破坏新疆与苏联之间友谊关系的事实，而且在他们的工作上、行动上、言论上以及喜欢研究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及趋向信仰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各方面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了是六大政策尤其是亲苏政策的正确执行者。**我在斯大林先生及其最亲近的战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经常领导之下，在七年的长时间与英日两帝国主义及托洛茨基匪徒的艰苦奋斗的宝贵经验中，我也学会了选拔忠实干部，我也学会了认识谁是忠实六大政策的忠实干部，如果李溥霖、李英奇是不忠实的分子，在我自己经常地特别提高了警觉性的考察人的条件之下，我决不能以审判英日两帝国主义走狗及托洛茨基匪徒并谋刺我的刺客的重大责任交付与他们二人办理**（张大军，1997：45）。

我对第三十四项的声付：该项所称各节虽然一部分有相当理由，可是聂色克不了解**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盛督办和在六大政策领导下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是完全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幸福的，不敢冤屈逮捕一个任何民族的人**（张大军，1997：46）。

盛世才的分析逻辑是：（1）自己处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经常领导下”，政治上必然是正确的，而且“学会了”如何识别干部；（2）李溥霖、李英奇是盛自己亲自选定来负



责审判这一重大案件的，所以必定是可靠的；（3）如果怀疑李溥霖、李英奇的可靠性，实际上就是不信任盛世才；（4）连斯大林主义忠实信徒盛世才也不相信的人，只能是斯大林的敌人——托洛茨基匪徒。

新疆在当时苏联的国际战略当中非常重要，斯大林需要一个稳定和亲苏的新疆。而盛世才至少在表面上对苏大林极力表示忠诚，在新疆全面执行亲苏政策，苏联军队驻扎在哈密等地，苏联顾问在新疆各地指导当地政府的工作，苏联可以随意在新疆开采矿藏，这些利益和战略影响力是斯大林决不愿意失去的。盛世才把话讲到了这个地步，斯大林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无论他是否真心相信这些苏联官员确是“托派”，他也必须把他们当作牺牲品来换取盛世才的继续效忠。

2. 对人犯审讯中提出的对自己不利的供词予以反驳

在对案犯口供进行驳辩时，盛世才对于涉及自身的那些指控，也一再强调自己对苏联和抗战的全力支持，在涉及的具体事务中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例如：

据阿不都海米提·买合苏多夫供称：库尔班·色以多夫（财政厅副厅长）说：“（盛世才）督办对于中央并不好好帮忙，自从抗战以来以援助抗战的名义向民众收集的捐款为数不少，寄往内地的也不过是十架飞机，依我看所募集的款不止十架飞机，应当还要多”。

的确我从来没有帮助过，并且也不能帮助国民党的中央，但是我对于中国的抗战是以最高的热诚帮助着，我曾开放了直接援助抗战的中运，我曾发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捐款，我曾尽全力地保护了中国西北的国际交通路线……这些事实，不是说明援助抗战吗？至于在民众中收集抗日捐款，是由新疆的民众联合会主办的，负责的人是反帝会秘书长王宝乾（现在的外交署长），政府并未派人参与其事，也没有染指的可能。同时政府也相信王宝乾在这工作中绝无贪污的情弊。那么库尔班·色以多夫这不是有心造谣吗？（张大军，1997：168）。

3. 强调新疆与中亚的特殊关联和相互影响

盛世才在报告书中多次提醒斯大林，新疆各突厥民族的血缘、语言、宗教、部落社会传统与苏联中亚各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强大作用下，新疆的形势有可能会影响苏联在中亚突厥民族地区的统治。

驻阿山苏联领事馆的秘书那扎洛夫……说：“中亚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是一样的，互相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哈族、乌兹别克、塔塔儿、塔吉克、土尔克尔等民族虽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单独的民族，因为按历史来看，他们都是土耳其血统。在苏联虽说是没有民族观念，但实际上民族还是存在着。无论哪个人还是爱着自己的民族，把一个民族同化成另一个民族，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将来中亚各民族团结起来，能成立一个很大的国家，那时用不着分东西土耳其斯坦了”（张大军，1997：178）。

苏联虽然进行了“民族识别”并为各“民族”设立了不同层级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但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对“阶级意识”的强调是远高于“民族意识”的。苏联中央政府一直极为警惕各少数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中亚的形势尤为特殊，在1917-1920年期间，中亚地区一直存在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中亚的“大突厥国家”的呼声。“要彻底打倒泛突厥主义，就要铲除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庞大的‘突厥民族’的自治共和国的怪影，首要的工作是对中亚的‘突厥民族’进行‘识别’，从而肢解现有的突厥斯坦共和国。……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五个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王智娟，1999：20-21）。所以，斯大林对中亚各国的局势一直是非常谨慎地加以关注和掌控的。

在1933-1937年期间，苏联全部10个加盟共和国即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党政领



导人都被清洗¹，同时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达格斯坦、车臣-印古什、楚瓦什等自治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也同时遭到清洗（赵常庆等，2007：125-126）。即使在这样的“大清洗”之后，斯大林也未必对中亚各国的苏共干部能够完全放心。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担心甚至也体现在斯大林对1944年在北疆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态度转变上，担心新疆如果真的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薛衔天，2008：348）。正是这一担心促使斯大林强迫势如破竹进军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袖停止军事行动，命令他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并建立新疆“联合政府”。

1940年盛世才在报告书中描画的这个包括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在内的“大突厥斯坦”国家蓝图，“中亚各民族团结起来，能成立一个很大的国家，那时无用不着分东西土耳其斯坦”，居然出自苏联驻阿山领事馆官员之口，这必然会引发斯大林对这些苏联外交官的不信任甚至愤怒。盛世才已经摸准了斯大林的这根脉。

4. 给该案主要嫌犯戴上“日本间谍”的帽子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大林一直面对着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希特勒德国这两个敌对国家。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后，得到了库页岛南部、南千岛群岛和东北的中东铁路，压缩了俄国在亚洲的发展空间。日本占领东北后，右翼势力一直鼓动关东军进攻苏联，只是日军在1939年“诺门坎”战役惨败以后，边境上才暂时安静起来。德军进攻苏联后，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同时进攻苏联，因此把大批军队集结在西伯利亚备战。只有在从中国方面获知日军的主攻方向不是“北上”而是“南下”（东南亚）之后，斯大林才松了一口气，把集结在西伯利亚的部分苏军调往吃紧的西部前线。所以，盛世才很清楚，只要一提到“日本间谍”绝对会触动斯大林的敏感神经。

据沙里福汗（阿山行政长）供称：“……在这次会议上，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公开发表说，他是汪精卫派来的，推翻新疆新政府，把新疆分成南北两路自治区域，北路由我（沙里福汗）领导，南疆由阿不都拉大毛拉（建设厅长）领导，在新疆组织一个新政府，由杜重远领导，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全靠日本。关于此话，大家都同意，没有发表其他的意见，杜并说对内政策是切断中苏的交通”（张大军，1997：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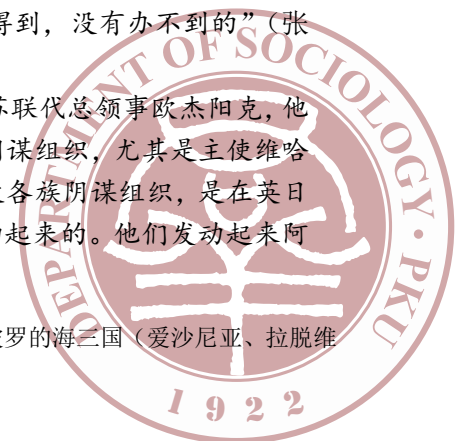
根据沙里福汗亲笔供的一切事实材料说明：……杜重远则直接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汪精卫的指示。其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方面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断绝中苏交通，破坏中国抗战后方的工作（张大军，1997：207）。

5. 在阴谋策动者的名单上除日本外，再加上英国

据沙里福汗供称：“……在宰牲节后第四天，阿不都拉大毛拉（建设厅长）在他的内室对我说，喀什的阴谋组织中有个艾里阿訇在本年（1940年）的1月间来省，然后他又给我们通了消息，关于金钱的帮助，曾由英国方面供给着在省城的阴谋组织，英国也经由喀什阴谋组织给汇钱来。……我对阿不都拉说，你们向杜重远说，通知日本来三四十架飞机，把迪化军事机关轰炸不好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援助？他说他能办得到，没有办不到的”（张大军，1997：198-199）。

……同时还充分地证明了前阿山苏联领事苏尔唐诺夫与前代苏联代总领事欧杰阳克，他们是互相联系起来作为英日帝国主义的帮凶者，和直接唆使各族阴谋组织，尤其是主使维哈两族谋叛首领进行反对新疆政府的工作。又同时更确切证明了此次各族阴谋组织，是在英日帝国主义唆使和援助之下，及托匪们的积极策动之下，成立和活动起来的。他们发动起来阿

¹ 在1930年代苏联内部有俄罗斯联邦和10个加盟共和国，在二战时期吸收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萨维亚，苏联解体时分裂为15个政治实体。



山的暴动，是籍此吸引政府的多数兵力到阿山方面去，然后乘各地特别是省城空虚之际相继举行暴动，并在省城暴动时进行谋刺（盛世才）督办，企图推翻现政府，在英日帝国主义扶植下与托匪们的策动下，在新疆建立起来反苏政权，以期破坏中国抗战并达成反苏之目的（张大军，1997：209-2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日签订《同盟条约》并在中国有长期合作的传统，如果统治印度的英国和占领中国东部的日本联起手来控制了新疆，日军就可以进军中亚。英国假如不便公开支持，也必然采取面对希特勒德国在中欧侵略行动时类似的“绥靖”政策，把祸水引向苏联。这一发展态势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必须加以遏制的。

四、盛世才在新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实践

为了取得斯大林的充分信任和在未来给予各方面的支持，盛世才在《报告书》里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在新疆的工作业绩也进行了全面总结。

我是信仰马、列、斯主义的，同时我又在实践中实行了马、列、斯主义，把马列斯主义很巧妙很灵活地以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式运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是落后的新疆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在1933年四月革命后，我所提出来六大政策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正确理论很灵活地很巧妙地应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推动落后的中国，尤其是新疆的落后社会加快走向发展和进步的道路。……另一方面作为发展新经济（经过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创造新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发展新文化（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指针。根据我信仰马、列、斯主义的立场，我是希望着马、列、斯主义的胜利（张大军，1997：382-383）。

盛世才不仅在思想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新疆各学校里要求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斯大林传》，还热情地接待了苏联派来的外交官、军事顾问、教官和技师，“对在新疆俄人委曲求全、低声下气和百倍和气”，只是在1938年盛加入苏共并与斯大林建立起个人联系后，他的腰板才挺起来，甚至在1940年的这一案件中敢于公开指控苏联的代总领事和内务部官员。

我在七年的过程中，根据着六大政策，特别是反帝、亲苏政策，根据我对于马、列、斯主义的坚决信仰，又根据苏联友邦派到新疆的外交人员及各顾问各专家各教官各技师的热情帮助，我对于他们怀无限的感激，不仅是我以百分的诚恳对待他们，而且他们所贡献的意见只要适合于新疆的环境，有利于抗战后方的新疆，有利于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我不但采纳和认真执行，同时，我还很严厉地督促部属认真的执行。所以七年以来就在这种情势下工作着，并没有发生过丝毫的摩擦与分歧，但是我现在突然检举耶果洛夫、欧杰阳克、阿不都热合满等不正确分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违反马、列、斯主义的错误，做下了背叛列宁斯大林党的罪行，尤其是内政部是与帝国主义及托洛茨基匪徒作斗争的机关，又是保障苏维埃社会主义安全及争取马列斯主义胜利的机关，他们既是内政部的人员，自己又做出帮助帝国主义走狗及掩护托匪的罪行，这更是罪不容恕的！”（张大军，1997：383-384）。

他们既然做出这样的错误，无疑地是违反了马、列、斯主义。我为了争取马、列、斯主义的前途胜利，我是应当这样来检举他们（张大军，1997：383）。

正是由于盛世才的坚定信仰与不懈努力，“新疆在我领导下亲苏政策已有七年来的历史，与苏联造成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张大军，1997：73）。盛世才在1935年和1937年两次分别向苏联借款500万金卢布和250万金卢布用于购买武器装备部队（陈慧生、陈超，2007：311）。据1934年担任苏联方面援助新疆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巴利明介绍：“从靴子到国民党徽章，我们从



头到尾装备了一万人的新疆军队，苏联顾问也被委任为（新疆省的）官员而实际掌握省的管理权力。……除名称外，新疆不久就成为了苏联的殖民地。……作为最高财政机关而新设立的新疆财政委员会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一切议案及预算支出，没有顾问的签名就不能生效”（王柯，2014：95）。苏联派了一个现代机械化团长期驻扎在哈密¹，没有苏军的直接参与，盛世才在与马仲英和张培元的作战中是不可能取胜的。

盛世才在《报告书》中标榜自己“把马列斯主义很巧妙很灵活地以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式运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是落后的新疆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中”，但是据说，“1936年盛世才编写《六大政策教程》时，每写完一章就会马上通过总领事馆送交斯大林审查”（王柯，2014：95），所以他的“六大政策”必然带有苏联意识形态的痕迹，也必然在实践中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我们在阅读盛世才的《报告书》时，也可从案犯的供词中看到苏联驻新疆各地领事馆外交人员是如何深深地介入甚至直接指挥地方政府的工作运行。在所谓“喀什阴谋暴动案”中，喀什公安局指导员阿不都哈德尔本人是苏联国籍，他“与苏联驻喀什副领事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关系十分密切，审讯的所有材料要交给领事馆的军事顾问莫斯科格维丁”。“在逮捕犯人方面又是奉军事顾问莫斯科格维丁的命令施行的。同时莫顾问和瓦副领事又均领导并参加了审讯工作”（张大军，1997：92）。

哈生明（喀什公安局长）供称：“在（省）政府召开三全代表大会时，喀什苏联领馆副领事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军事顾问莫斯科格维丁命我赴迪化充代表，并命我向蒋司令报告要汽车”（张大军，1997：91）。一个地区公安局长出差去出席省里的会议，这个任务居然是由苏联领事和苏联军事顾问下达的，这种工作关系在中国其他地区（除了日军占领区）恐怕是找不到的。

在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其他省区，政府的旗帜统一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在新疆，盛世才打出来的却一直是有一个六角星（象征他提出的“六大政策”）的红旗。下图是当年新疆的宣传画，风格与苏联政治宣传画风十分相似，这也真称得上是民国历史中的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盛世才十年“新疆王”的六星红旗

资料来源：张大军，1997：138。

¹ “该团团长为少将衔，下辖步兵 680 余人，骑兵 700 余人，摩托兵 560 余人，坦克兵 400 余人，飞行员 100 余人，总兵力超过 3000 人，配备摩托车 100 多辆，大小炮数百门，坦克 50-60 辆，飞机近百架”（陈慧生、陈超，2007：312-313）。这支苏军驻扎在连接甘肃的新疆东部门户哈密，就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所属军队进入新疆。



当然，在 1942 年盛世才决定反苏反共、投向蒋介石政府后，他向蒋政府提交的对自己推行“六大政策”的解释和对 1940 年的“国际阴谋暴动案”的说明，自然与《上斯大林报告书》的内容很不一样，他在 1942 年 7 月 7 日呈交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简略地提到：

“破获了新疆维吾尔族、塔塔尔、归化族、回族的大阴谋暴动案，该案之目的，是要把新疆脱离中国，成立维吾尔斯坦。该案之参加者，均系新疆各族中最有名望之人物，而该案之策动者，则系苏联前任驻迪化总领事欧杰阳克。该案破获后，所有刺客十数人，参加百数十人均经就擒，因此职（盛自称）为了测验该案北京，是否苏联政府之行为，所以去了上述的信件，以观苏联政府如何答复，他们已识破了是职（盛自称）的试探，所以迄今未得答复”（张大军，1980：4082-4083）。

盛世才花言巧语，两句话就把 1940 年与斯大林的多次电报、信件往来蒙混过去。他对自己加入苏共给蒋介石的解释是“实由学识与经验之不足，致被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的人们所愚弄欺骗”，对于 1941 年建议苏联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则是“籍以测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而并非“真实请求”，“是以职（盛自称）今后决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蒋则对之好言慰抚，“既往一切不但原宥，且均为负责”（黄建华，2003：68）。

后来盛世才随着蒋介石到了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国防部上将高参和行政院设计委员，出版《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¹。1970 年 7 月 13 日在台北病逝，终年 76 岁。

结束语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 年）既是中国社会从专制皇权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也是全国军民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日本侵略军、关系到民族存亡的特殊时期。纵观国内学术界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对于边疆地区（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等）的关注相对较弱，但是这些地区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在今天，对于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发展、经济繁荣都极为重要。新疆面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历史上即是内地通向中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今天同样居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要想认识今天的新疆，就必须了解历史上的新疆，而 1933-1944 年盛世才在新疆的 12 年统治，就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领域里，《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与《新疆风暴七十年》一样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汇编，我希望类似这样的民国档案材料能够逐步引起国内学者更多的重视。

参考书目：

- 包尔汉，1984，《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 陈慧生、陈超，2007，《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黄建华，2003，《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柯，2014，《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王智娟，1999，“现代国家：民族国家的组建”，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3-32 页。
- 薛衔天，2008，“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345-359 页。
- 张大军，1980，《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
- 张大军主编，1997，《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台中：中亚出版社。
- 赵常庆等，2007，《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¹ 盛世才在《新疆十年回忆录》中，也曾提到 1940 年的“国际阴谋暴动案”（张大军，1980：4088-4089）。

